

刘季平同志生平

刘季平同志原名刘焕宗，1908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县双甸镇北乡袁家庄，1915年举家迁居双甸镇南乡丛家坝（现为双甸乡石坝村）。其父刘逸东一向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他幼时即在其叔父刘心梅创办的丛坝初级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升入双甸镇高等小学。该镇离丛坝乡约五、六华里，每天步行来回，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辍学。

1921年高小毕业，他考入南通市甲种商业学校，后因病退学。1924年他转入如皋师范学习。1927年元旦中共如皋县委成立后，他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于是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如皋县委和泰兴县委共同研究，决定“五·一”联合行动，在如皋西南乡举行一次农民武装大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着疯狂的镇压，城乡完全沉浸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县委决定全部党员暂时撤离县城，向四乡隐蔽。他始离开如师，回到家乡，暂在丛坝小学担任代课教师。

1928年春，他离开家乡去南京晓庄师范读书，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中共南京市委。是年夏，晓庄师范建立了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他担任中共晓庄师范支部书记。当时，南京附近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宁，晓庄僻处郊外，环境更坏，后由该校校长陶行知出面，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弄到一批枪，几箱子弹，成立了一个“联村自卫团”的组织，除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当总指挥外，由他担任副总指挥。嗣后工作需要，南京市委将他调到市委工作，担任宣传部部长，这样，他就离开了晓庄师范。

1930年初，中共南京市委研究布置争取公开活动时，曾派他到上海了解“中国自由大同盟”开展活动的经验。回南京后，即在大中学校进步师生中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南京分会”，成立后任分会常委及党团书记。3月底，在“争取公开活动”的口号下，爆发

了南京和记洋行的工人斗争。和记洋行是英商资本家办的一家蛋厂。资本家压迫工人很残酷，市委决定组织群众支援和记洋行的工人斗争。并决定4月5日这天举行示威游行，南京市委派他负责组织这次活动。他接受了市委这项任务，即积极组织发动。到了这一天，各支部共动员了几百人，晓庄师范党支部也来了一百多人，齐集在中央大学的操场上，准备游行到和记洋行和下关码头去，虽然人数不是顶多，可在当时已把国民党吓得胆颤心寒，立即下令关闭通往下关的城门，并在和记洋行屋顶上架起机关枪。他不畏强暴，一马当先，带领群众，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到达了和记洋行大门口，由于大门紧闭，大家只好集中在和记洋行附近的煤炭码头，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进行了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这件事成为当时国民党首都前所未有的特等大事。

这年4月下旬，南京市委决定合并党团组织，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着手准备组织5月30日的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的“五罢”大暴动。当时，党的地下组织，虽已逐渐恢复，但基础还比较薄弱，力量也不够强大，发动这样大规模的“五罢”大暴动，困难当然不少，大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接受任务后，去金陵大学发动学生时，当场被捕，被送到苏州顾颉刚高等法院审理。审理终结，被判刑羁押于苏州十字监后因参加“特支”活动，当年冬又被苏州顾高等法院移送镇江顾军法会审法庭。他与同监难友四人被关押在镇江麒麟谷顶狱队，经与家乡父亲联系后，父亲与同乡崔爽吾来监探望，送食物时暗中藏了钥匙。同监五人分别扭开脚镣上的铁链，仍用布条缠住以麻痹看守，等到除夕夜即1931年2月季平越狱逃脱成功，潜往上海。1932年组织了“教育者联盟”简称“教联”，李平任“教联”党内负责人继续投入革命活动，6月，第二次被捕入狱，直至全面展开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各监狱继续释放了

一批政治犯，他于1937年8月也被释放出狱。从1932年6月至1937年8月，他在敌人监狱里整整度过五个年头。这五年中，他组织难友学习马列主义，曾以“满力涛”笔名，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政治、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文章。并积极建立狱中党组织，领导大狱闹、越狱等斗争。在敌人的残酷折磨和法庭逼供下，他坚贞不屈，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

他被释放出狱后，即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中，先后在武汉、桂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动。历任抗战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支委员，生活教育社常务理事等职。1941年2月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长，苏中第二专员公署专员，新四军第一师抗大九分校副校长，党委书记，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苏中党校校长。在苏中、苏南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培养训练干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挑衅进攻，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第一师干部教育工作，作出了不少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后方机关“黄河”大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等职，积极从事部队的新式整军和党的战时教育工作，协助我军胜利渡江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后，他历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行政公署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山东、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代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国务院文化部顾问等职。他在上海期间，对上海的经济、外事、统战、文教、

卫生、科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对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他在山东、安徽工作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时。他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坚决不要特殊照顾，经常深入到灾区调查慰问，总结推广生产自救的经验，领导群众度荒。并积极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地认真地进行甄别平反，从而稳定了当时两省的形势，落实了党的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他一生关心和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在国务院教育部工作期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始终如一地贯彻中央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认真探索中国发展普教事业的新路子。

十年动乱，一开始他就蒙受冤屈。遇到陷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抵制“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诬陷和迫害过程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他非常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是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早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为新馆的建设，付出了不少心血。1975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他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组织全国力量，历经十年之久，终使周总理的遗愿得以实现。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他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创始人。1980年5月他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这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他退居二线以后，仍认真学习中央各次重要会议决定的精神，不断调查研究，搜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实际问题，并多次向有关领导

同志： 国教育的建议。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他主： 中国现代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并组织
有关： 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自任研究会会长。

： 87年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是年6月在北京逝世，
终年： 在逝世前不久，曾在病榻上写了《日记一则》他说：

“我： 4岁，开始步入80岁行程，今年2月又是我加入中
国共 十年的年龄，可以说是出生八十载，入党六十年。”他

在日： 了过去，评价了自己，他说：“在六十个年头里，有
一半： 5，收获得少。头十年大部份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

的： 有斗争和个人的学习收获，但基本上未能做什么工
作： 单头几年过着隔离或靠边生活，后来也只能勉强敲

了几年边鼓，便在实际上离休了”。“至于中间的三十年，即从

1937年“八、一三”出狱，到“文革”初被宣布隔离止，尽管先
后在上海、武汉、桂林、苏中、苏皖、苏南、山东、安徽、教育部等
处参加了好些工作，而且始终都是服从革命需要，党叫干什么，就干
什么，从未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工作起来也都能认真负责，常常夜以
继日，废寝忘食，从未偷懒不干，可是究竟有多大贡献，有哪些教训，
还得好好总结，既不是任何人得以随便抹煞，也不是专卖“六十年老
革命大红帽”所能任意吹大的，最大的幸运，只在于生逢曲折多变，
危险丛生的乱区，提着头走路，终于走过来了”。

总之，刘季平同志在六十年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
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具有革命的胆量，为人正直，光明磊落，
刻苦学习，办事果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平易近人，
深受大家的尊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积极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坚定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虽然年事已高，仍念

念不忘四化建设和教育改革事业的发展，并坚持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组织生活，自觉抵制一切不正之风，保持了革命晚节。

(缪子中整理)

XX

《如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主要内容预告

《如东文史资料》第三辑将在近期出版发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

在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一组文章中，有对在抗日战争中作过重要贡献的王野翔、叶胥朝等同志的回顾；有对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与日伪展开斗争的刘逸东老人、黄埔军校教导总队第二团及爱国商人的追忆；还有是对日伪罪行的揭露和控诉。

在工商史料方面除选登了有关如东工商业、工商团体和合作社经济等发展的专题资料外，还介绍了如东工商界具有影响和名望的冷德厚等同志的史料，并刊用了掘港的西永升酱糟坊、钱仁记粮行、东宾印刷馆、第一楼菜馆、拼茶的包震泰布店、沈震大海味店、丰利的葆三堂药店及如东著名的三伏虾油、白粮干丝、草炉烧饼、旱烟和“一把抓”痒疮药的史话。

这一辑还在“如东一镇”中登载了反映马塘的六篇资料。

三份遗嘱 一片丹心

——刘季平同志崇高的晚节

周 春 澄

北京的7月，气温常在摄氏36度左右，天气特别闷热。20日下午，我去三里河已故文化部顾问刘季平同志家中跟刘老夫人吴瀚同志商谈有关为刘老立传的问题。吴瀚同志沉痛地告诉我：去年10月刘老准备去上海参加“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首届学术研讨会”，因咳嗽不愈于临行前就诊，发现得了肺癌。上海之行未成，自知得了不治之症，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亲笔写了三份遗嘱。

其一，我的病如已发展到无法治疗的程度，就不要勉强抢救，否则会增加麻烦与病痛。

其二，无论在我病危期间或死后，在外地定居和工作的子女全都不要远道前来探视。

其三，我死后的遗体，立即献给医院解剖。医院需要利用任何部份作病理标本都由医院决定，家人不得干预。这事如须办理法律手续，请老伴吴瀚同志与医院商办。

我读了这三份遗书，顿时泪水模糊了视线，一个党性坚强，品质高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矗立在眼前。刘季平同志“出生八十载，入党六十年”，历任苏中行署文教处长、苏皖苏南行署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山东、安徽省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文化部顾问等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按常理在病重期间，多花几个钱用于治疗疾病和料理后事并不为过份。可是刘老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非常严格约束自己，不肯多花国家一分钱。今年5月上旬，因油漆气味过敏反应，肺部呼吸困难，子女把他安排到中央组

织部招待所休息，那里住宿条件比较好，住了四天，病情好转了。后来，刘老听说招待所房金较贵，便说：“我已离休，不应该再花国家的钱住高级招待所”。硬要坚持回家，结果不久病势转重。他坚持不肯住院，甚至拒绝使用贵重的医物。他说：把这些药给还能继续为党工作的同志用吧！终于在今年6月11日与世长辞了。

刘老身居高位，仍然时刻不忘艰苦朴素，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身体力行地倡导移风易俗。他的后事料理一切从简的新风尚，新思想在他的遗作《学新规》中得到完整的显示：

学新规

今天已是新社会，	×	追悼告别徒相扰，
丧事自宜学新规。		铺张浪费反目卑。
遗体献为解剖物，	×	儿女各自安职守，
骨灰用作农杯肥。		莫为奔丧枉来回。

刘老的三份遗书，集中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刘老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所知道的俞铭璜

俞大成

俞铭璜是我的堂叔，他虽然在辈分上比我长一个字，但年龄却和我相差无几。我的叔祖（俞铭璜的父亲）早年就离开丰利老家去如皋习艺经商，后来就在如皋安了家，立了业（开布店）。俞铭璜是出生在如皋城内的。但他对丰利很有感情，常自称是如皋丰利人。（当时如东县系如皋东乡）我的妹妹福如十二、三岁的时候，到如皋县立中学读初中，就住在铭璜叔家中，（那时女孩子读初中并不普遍）。他很喜欢福如，曾教她学击剑，并曾在如皋县的一次学生运动会上派过表演，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学时期的铭璜叔虽然年龄不大，但无论他在如皋县立中学就读时，这是后来在南通中学就读时，都是全校师生特别瞩目的人物。在如皋县中时，他经常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密切交往，并曾主持过如皋日报副刊《春泥》的编辑工作，经常发表文章，署名萃菴。

他当时有许多行动，令我们既钦佩又大惑不解。有一次，如皋西乡有位乡村教师，生了重病，学生们因此也无法上课，铭璜叔得知后，竟放弃学习，主动去替他无偿代课。一班纨绔子弟的学生，还以为俞铭璜是个大傻子呢！

后来，他在无锡国专学习一年后，也转到南通中学来读书。和我同校。可能由于优异成绩和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吧，他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中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另眼看待。那时正是日军侵华国难当头的时候，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铭璜叔曾参加校刊《南通中学生》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多篇文章。

他也曾主持过学校剧团的组织工作，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

记得在1936年前后的一个夜晚，曾假座南新新大戏院（系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的父亲所开办），演出了夏衍编著的爱国戏剧——自由魂，该剧充分表现了女侠秋瑾的革命精神。璜叔在剧中还担任了女侠丈夫——王莱钧的角色，演得维妙维肖。那晚，观众从舞台边到进出口挤得水泄不通。

璜叔的多才多艺是大家公认的。他的书法也高我一筹，写得十分优美、漂亮。

1937年夏，我高中毕业回到丰利家中，在那战火蔓延，国难深重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不成熟的青年，我也感到深深的苦闷，曾写过一信寄他。他在回信上写道：‘今后我们的关系，不应该是叔叔侄女的关系，而应该是比各目成就的关系。’我接读后，把他的信（无论内容和形式）和我的相比，深深地感到惭愧，但也深受教益。以后战火蔓延，各目漂泊流离，我们就终此生未能再见一面或再通一信，而他于1964年就不幸谢世了！当我听到璜叔逝世的消息已载诸报端时，我震动痛苦得呆若木鸡，消魂落魄者累日。

当然，璜叔青少年时期的形象，将永远活跃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有生之余年，当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他对我的期望。